

为他提出的三点问题很有价值。所谓共同态度，按照我的理解，它是一种立场，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出发点，一种指导思想，一种意识或价值取向。这种观点对我们搞中国学的也好，国别学的也好，都非常重要。当然国别学的范围很宽了。我本人主要是做日本研究的，当然就涉及到中国也有一个日本学的问题，也要构筑，所以这篇论文对我的启迪非常大。我完全赞成加加美教授文章里提示的三个前提，这三个前提是非常重要的，我就不再重复了。但是我想说，按照加加美教授的这样一个建议，发达国家不能搞一种居高临下的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反过来也一样的，发展中国家也不能以一种自以为是的，或者反过来说是从属性的态度来研究发达国家。我就讲这些吧，谢谢！

●—司会 それでは、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の陳東林先生にお願いします。

●—陳東林 加加美光行教授の論文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很有启发性的课题，就是克服现代中国学研究中的东方主义倾向，加强共性研究。加加美教授是从日本现代中国学的历史回顾提出的，而我们中国学者作为现代中国学的本体，从中国历史的角度来进行回顾和考察，我认为也是很有意义的。加加美教授的论文用四分之三的篇幅进行了美国和日本的现代中国学走过的路，那么在中国应不应该叫现代中国学，或者叫当代中国学，我不敢下定论，但是我认为可以以加加美教授的回顾作为一个主线，回顾一下在中国国内现代中国学研究走过的历程。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国内的中国问题研究，也可以叫做当代中国学研究，实际上是和政治原则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加加美教授所说的国策性。而毛泽东的地域观念，指导着这种研究的走向。详细的内容在我的论文中有，这里就不详细讲了，那么我讲的是在80年代以前，在中国国内的中国问题研究，基本上是国策研究，或者说是一种国家任

务，它属于官方的一种领域。当时的中国国内问题研究机构比较少，我所知道的比如有中央党校、外交部、总参谋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等少数的机构，基本上是从一种为官方政策服务的配合工作，比如说像“九评”的文章就是这样的一个研究成果。随着中苏大论战的进行，这种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实际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精神领域的争夺战。在意识形态上，于是出现了反东方主义的极端倾向，也就是说，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文化大革命”中宣传中国是革命的中心，以对抗美国、苏联的意识形态霸权地位。这种中国中心的论断，与其说是真正地相信中国会成为世界革命中心，不如说是用来对抗“东方主义”即美苏霸权主义的。而在历史学界、在意识形态上树立的东方主义的大旗有一些例子，比如说在70年代，苏联的齐赫文斯基院士编写了反对中国共产党路线的《中国近代史》，以及当时对中国问题研究的最多的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写了一系列带有严重政治色彩的宣传品，意思是说中国背离了苏联的东方中心。那么中国方面，也在学术上进行了反东方主义的反击，比如中国方面组织编写了《美国侵华史》，然后又组织编写了《沙俄侵华史》。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因为70年代中国的政策是联合第二世界日本，出于这种需要，对于侵略中国最严重的日本却迟迟没有写出《日本侵华史》。所以在当时的反东方主义的国策性质的教育下，这种客观性是服务政治的。历史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但在当今中国国内，我认为仍然可以找到东方主义和反东方主义两种形态的遗留，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复活，一种是以西方中国学研究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倾向，另一种是复活中国革命中心论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而另一方面，在中国脱离国策性的独立研究思考，在大学和科研机构中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潮流，甚至出现了民间的中国问题研究者。

因此，无论在克服错误性方面，还是加强共同性研究方面，加加美教授的论文，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召开的多次研讨会，都提出了一个值得我们共同努力的方向。

最后，我想谈一点稿子里没有写的内容，也就是说对加加美教授这篇文章中的一些概念进行一些探讨。首先，现代中国学是不是需要一个新的定位，它和几十年前的现代中国学概念是否还是一样的？现代中国学有没有主体意识？从我们现在参加大会的发言来看，大家提到的现代中国学，都是从客体，也就是从中国以外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的。那么中国本身能不能称作现代中国学的研究？这种研究和中国的当代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之间有什么关系？是不是各种学科的总和？我认为这个问题值得研究。关于新范式，很多学者已经进行论证了，我在这里不再赘述。最后，我再讲一下关于国策研究的几句话。完全定位于国策研究的、为国策服务的研究是应该避免的，我认为在中国当前已经出现了那种开始社会化国策研究的有利条件，也就是说不是单纯为国策服务的研究。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很多国内学者都知道的一种“沈志华现象”，沈志华先生是国内一个民间的中国问题研究者，现在在中国被视为是一流的学者，在座的比如金观涛先生跟他很熟悉，加加美先生也应该了解，因为他的夫人李丹慧女士曾经和你一起工作过。那么，作为沈志华、李丹慧的研究成果，我认为在国内值得评价的就是说，无论从官方角度，从民间角度，从中国改革的激进派还是稳健派来说，还有从美国方面，从日本方面，甚至台湾方面，这些学者都对他们的成果予以认可。所以我觉得加加美先生提出的共同认识论，如果我们找准了这个前提的话，是可以实现的。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因为听了前面的发言，或者在会议讨论中间，大家对这种共同认识论能不能实现有所怀疑，

所以我想我个人的理解，加加美教授提出的共同认识论不是要所有的研究都得出共同的结论，而是要通过共同的研究探讨来共同接近真相。我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我的发言完了，谢谢大家！

●—司会 引き続きまして、南京大学の周晓虹先生にお願いします。

●—周晓虹 大家好！我今天非常高兴有机会在这里做关于加加美先生所提出的建立一种新的中国研究范式的讨论。我给会议提供的一篇文章比较长，所以我只能简单地来谈一下我的基本看法。在中国研究的过程中，刚才很多的学者，包括上午加加美先生都提到，它最先是作为一种国别研究发展而来的，那么这样一个状态，实际上决定了它最初是冷战的一个产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冷战的产物。我认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大家都提到，刚才 Madsen 教授的讲演中也提到了他的老师 John King Fairbank，也就是费正清，实际上我觉得他最重要的是将一种原先有关中国文化典籍历史的汉学研究，转型为一门包括各种社会科学在内的一种综合性的社会科学研究，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中国研究，我认为这是他做得最为成功的一点。但是刚才讲到，关于这种冷战状态下的国别研究，那么我在想，是不是国别研究就一定会导致东方主义这样一种论断，或者说它是否一定就不能够坚持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中立，或者我们叫它价值无涉，就是 Value-free 的这样一种立场，我认为并不尽然，因为我们知道，马克斯·韦伯最早在他的方法论的著作中讨论价值中立的时候，实际上价值中立是有一个限度的，那么这个限度就在于价值在研究者重试你的研究，进行问题的选择的时候，马克斯·韦伯并不反对或者不否认研究者存在着价值的涉入这样的一种现象，但是马克斯·韦伯所坚持的是在你搜集到资料并且对资料进行解读的时候，你这时应该保持客观的立